

十九岁女孩第一次听《同一首歌》的回忆

——纽约新唐人晚会演员黄柏燊的自述

第一次亲耳听 是在监狱，我19岁

思绪一瞬间又把我拉回了几年前，我仍然清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它，是在监狱，那年我19岁。

从小到大，由于加入了共青团还曾被5次评为优秀三好学生，区三好学生，以及一次全国优秀三好学生，因此，我的青春总带着朝气蓬勃的自信与骄傲，

和朦胧的青涩与天真。我出生在一个改革开放后富裕的家庭，总是同学中最先拥有电脑的人，最先由父母开车送我上学的人。

那时，我简单的觉得讲一句真话，发出和共产党不同的声音没什么错，于是当时在海外求学的我，毫不迟疑的在国内重大冤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的几年里，不断的把在海外留学其间大量媒体报导的事实真相，杂志，报纸，剪报，电视录音等资料带回国内，告诉亲朋好友。

仅仅因为这样，中共动用安全局，特务，网络，窃听等高科技技术，将我非法抓捕，拘留。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放着这么多违法犯罪贪污腐化不管，为什么动用那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抓捕我一个19岁的女孩？因为中共看重的不是人的生命，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利和稳定，当世界上的共产党一个又一个倒台，他就怕自己的人民会把自己推翻，于是，他只允许一个声音，愚民政策，只高唱同一个论调，这与《同一首歌》背后的目的不谋而合。

在这样一个年纪，被以往倍感亲切的“警察叔叔”带进了一座灰暗的钢筋水泥房子的感觉是怪异的，他们告诉我，这是监狱。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开始我甚至不觉得恐惧。直到住了一段时间后，这辈子才明白什么叫恐惧。恐惧没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恐惧度日如年，恐惧手铐的声音，恐惧失眠，恐惧24小时无法熄灭的灯和不停转动的监视摄像机，恐惧父母的安危，恐惧洗脑，还有，恐惧听“同一首歌”。

“我说，我要回家。”

警察在乎的不是我的对与错，而是在乎我能不能附和党的声音，我必须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发出同一种声音，唱同一首歌。我说“如果说不呢，如果我不想唱，我想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呢？”他们说“那将永远



本文作者：黄柏燊

葫芦岛见证

第九期 2007年8月8日

揭开《同一首歌》的面纱

据悉，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将于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电厂进行露天演出。消息传出，很多“追星族”满怀期待要一睹为快。

然而，在海内外有很多善良人却对《同一首歌》非常反感，甚至在美国《同一首歌》还遭到了起诉。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共为何要费劲心机让大家和它唱《同一首歌》呢？在当红歌星热闹的表演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

让我们一起揭开《同一首歌》的面纱……



不会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除了你自己，别这么顽固，说不定，有天你自己都无法发出这声音了，还有没有你都不一定。”

我记得那是早春，我刚刚告别18岁，我一个人，拿着一个脸盆，一双塑料拖鞋，一片卫生巾，走进了冰冷的监狱。一扇扇厚重的铁门上，从那低低的送饭的小窗口里面探出一束束好奇的目光，我仿佛听见一些喃呢，“这么小的女孩，怎么被送会到关死囚的地方？她犯了什么罪？”身边的女警立刻把小窗一个个关上，到了走廊的尽头，最后一间，她打开了房间，让我进去，硕大的房间，几个监视器高高在上，监视器下是厕所，淋浴，和一张小床。

有些人，有些声音，可以随着岁月被淡忘。《同一首歌》除外，因为那是我在监狱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第一次，也是最多的一次，听了很多遍，很痛苦，很麻木，听的甚至都有想死的念头，这也是第一次，想死。

当时的我如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听《同一首歌》。那带血的记忆连同“同一首歌”像长在肉里的刺一般，拔不掉，洗不去，多年后，虽然身体健硕，常常午夜梦回惊醒在自己的小床上，不知身在何方，又以为是监狱，当发现不是后重重的喘一口气，然后慢慢的，自胸口传上来一股热辣辣的疼痛，化做滚烫的泪水，一遍又一遍浸湿了咸咸的枕头。（转下页）

《同一首歌》美国被起诉



2006年1月，《同一首歌》在美国因被指控遭中共利用作为政治迫害和强制洗脑的工具而被起诉。上图为代表受害者的原告律师泰瑞·玛什在纽约曼哈顿无线电城大剧院(Radio City Music Hall)外透露，“同歌”制片主任刘志强和晚会总导演孟欣，连同先前被起诉的另外三人，已在1月23日收到法院传票。

关于《同一首歌》在强制洗脑中扮演的角色，法轮功学员丁女士讲到：当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进劳改所或洗脑班后，会得到一张《同一首歌》的唱片，“他们逼你唱，你不张嘴，他们就打你。”另一种形式是让你站在走廊上，然后围上来一帮人，对着你唱这首歌。还有就是在持续酷刑后，软硬兼施逼你在不再炼功的保证书上签名时，他们一起对你唱这首歌。 ◇

拒绝与中共唱同一首歌



《九评共产党》一书自2004年出版风靡海内外，掀起“三退”（退出党/团/队）大潮，面对即将到来的“天灭中共”，截止2007年8月，在海外网站公开声明三退的已达2450万人，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

（上图为2007年3月海外声援2000万三退大潮集会）

而《同一首歌》，作为中共在精神上迫害法轮功的象征，也是它掩盖其暴行的伴奏曲。其背后隐藏着无比阴险毒辣的罪恶和千千万万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无法计数的苦难和血泪。随着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个一个地被揭露，《同一首歌》看似美好的歌曲，最终在历史上，将与纳粹的标志一样成为可耻和罪恶的象征。今后的人们，将不会有人再唱这首歌。一想起它，就会联想到它背后充满了血腥和罪恶。再华丽漂亮的衣服，再丰富美味的佳肴，当你知道它曾经沾染过血腥和杀戮，你还想穿它吗？你还能吃的下去吗？ ◇

第一次被逼在陌生人前脱光衣服

（接上页）在监狱里的回忆，有许许多多人第一次的经历，《同一首歌》一直伴随着我。

第一次被逼在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检查的记忆，当时我来着月经，零下几度的室温，内裤都被脱下检查，还要搜身，当时已不记得有没有羞耻感，吓傻了一般，只是冷的不停发抖，血，沿着我的大腿往下滑，流到冰冷的地上。电视里在放《同一首歌》，周围的人面无表情的看着我。

第一次带手铐；第一次在监视摄像机面前上厕所；第一次在摄像机面前洗澡；第一次在半夜醒来在空荡荡的监狱房间里，发现监狱所长坐在床边触摸我的脸；第一次清晨洗脸时，发现自己有白头发；第一次看到刑房，第一次被监狱的医生用橡皮管子威胁要插食道灌食。

第一次得知家里被抄，第一次听说父母被抓走时的心情。第一次在监狱里读想要轻生的母亲写给我的信。第一次在监狱听说母亲心脏病发而无法探望她的感受。全都历历在目。

与移民官的对话

2003年我来到美国。身无分文，我填了表格申请庇护，移民官对我这么小年纪的人感觉好奇问了许多，最后他说“指标很少，大部份的人面试不会通过，过不了你会成为非法移民，可能被递解出境，你怕吗？”我说“我不怕，我经历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他说“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让你呆在美国。”

我说：“先生，我不知道您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冒着生命危险为说句真话穿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良心与谎言之间，生与死之间，我没有喝酒，没有赌博，没有吸毒，我成绩全A，这样的人，你觉得她在19岁时会怎么样？您能想到她被中共关进死牢吗，而且不是她一个人，是她全家，共产党让她的学校开除她，抓捕她的同学，朋友，甚至在飞机上跟她闲聊的旅客都被抓走审问，您认为这样的国家，我能生存吗？我认为我不能，我也不想离开家人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也不想和父母失去联络，我也不想被学校开除，我也不想背井离乡，可是您也知道，人要有人活着的权利，如果没有，那我是活不下去的，因为我认为，人权是生命最重要的自由，她比生命还重要。”

就这样，我是他们移民局那个星期唯一面试当场通过拿到合法居住权和受教育权的人。

* * * *

写出这些，我要让参与制作《同一首歌》的所有媒体工作人员以及全世界媒介知道：

歌舞升平的宣传假象掩盖不了千千万万象我一样家破人亡的悲剧，《同一首歌》是个谎言，一个声音掩盖不了13亿人的声音，因为，墨写的谎言，怎能掩盖血写的事实。